

从《新小说》探析中国近代小说启蒙思想的生成

宋朝红^{1*}

(^{1*}烟台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 1902 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 其将小说提升为启蒙与救国的工具, 这体现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冲击下的民族意识。《新小说》的创刊背景、作者群体及内容呈现, 体现了小说启蒙思想的萌生、传播与实践的过程。《新小说》对推动小说革命、激发民众政治觉悟有着重要作用, 但同时由于市场导向、读者趣味及清政府压制, 使启蒙功能逐渐边缘化, 文学审美价值占据主导。这些反映晚清文学转型与知识分子救亡实践的复杂演变。

关键词: 《新小说》; 小说启蒙; 梁启超; 杂志

Exploring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 Enlightenment Thought through *Xin Xiaoshuo*

Song Chaohong^{1*}

(^{1*}School of Chinese and Law, Yant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tai, Shandong 264000, China)

Abstract: In 1902, Liang Qichao founded *Xin Xiaoshuo*, elevating the novel into a tool for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reflecting the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of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thought. The magazine's founding background, authorial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presentation illustrate the emergence, disse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novel-based enlightenment thought. *Xin Xiaoshu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novel revolution and raising public political awareness. However, due to market orientation, shifting reader tastes, and government censorship, its enlightenment function gradually became marginalized, whil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values came to dominate. These developments reflect the complex evolution of late Qing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efforts for national salvation.

Key words: *Xin Xiaoshuo*; Novel Enlightenment; Liang Qichao; magazine

引言

1902 年, 梁启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小说杂志《新小说》, 它是晚清文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彼时, 整个晚清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在艰难探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 而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中所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也正好印证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影响下对于“公共空间”“民族共同想象”的重视。这也进一步表明, 《新小说》杂志的创办不是历史的偶然, 而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思想冲击后的一个必然选择。对于《新小说》的研究, 不仅是对现代中国文学转型的研究, 更是涉及到现代历史的考察, 对把握晚清小说作家以及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流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小说〉杂志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1]中提到对于《新小说》的研究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都维持在一个峰值上,这实属罕见,直到近些年对《新小说》的研究才逐渐降温。对《新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做文献研究,对于创刊和出版细节进行考据梳理,如日本研究者樽本照雄的《〈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2]详实地考究了杂志的创办地点以及印刷日期等;二是对《新小说》出版内容进行研究,涉及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从中梳理出杂志的文学观,如王岩的《在〈新小说〉——小说观念研究》,其认为杂志的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小说主题与题材进行创作实验;三是对《新小说》中体现的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思想进行研究,如张怀宇《启蒙的精神与救亡的努力——试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3]一文将《新小说》与梁启超的文艺思想结合,强调《新小说》在启蒙与救亡两个层面满足了政治上的需求。四是对《新小说》的历史地位以及影响等进行研究,如苟强诗在《小说界与现代小说概念的生成》^[4]中强调《新小说》将文学与报刊联袂的首创性对报刊文学的意义深远。本文则是在历史、文学、出版的交叉学科背景下,从《新小说》这一载体出发,梳理小说启蒙思想发生的脉络,探寻二十世纪初知识精英群体对小说启蒙思想的接受、传播以及实践,分析他们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小说翻译等,将小说提升为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核心工具。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的主动回应,还彰显了《新小说》作为思想载体在推动小说革命的枢纽作用,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 小说启蒙思想的萌生——《新小说》创刊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梁启超看到依赖清政府救国遥遥无期,他开始思索新的救亡之路。当时由于西方思想的传入,梁启超发现了“群”的价值,也就是拯救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建立民族共同体则需要先拥有“新民”。他在《新民说》中提到:“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5]。所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思考新的救国路径则是培养新民,由新民来一同构建新的中国。但是如何将晚清时期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民众培养成新民?他将目光投向了文学界,并将小说的地位从“娱乐功能”提升到了“救国救亡”的政治功能之上。追溯梁启超这种“小说救国”的启蒙思想,不难发现,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都萌生过类似思考。

比如1895年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登过一则小说征文广告《求著时新小说启》,文中说:“窃以感动人气,贬义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6]这则短文很明确地将小说提升为革除三害的良药,认为中国的旧习俗可以同通俗易懂的小说来进行改变。这则征文活动在《申报》刊登过5次,并且获奖者有奖金150元。广告的影响很大,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一个很明确的启示就是,小说不仅仅是消遣之物,还可用来开启民智。

另外,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曾提到:“夫说部之兴,其入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逐不免为说部之所持”^[7]。此段话,说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越加认可小说可以移风易俗,革弊除害。

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曾道:“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于小说”^[8]。他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并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另外,他在流亡日本时接触到了更多日本政治小说的范本如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构想着小说与报刊的进一步联姻,以此来唤醒更多的民众,营造一个民族共同体。

1902年2月,梁启超先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刊登一篇文章《中国唯一之文学〈新小说〉》,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认为是《新小说》杂志的征稿启事:“……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器爱国精神,一切淫猥弊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9]几个月后,也就是1902年11月,梁启超经过了思想上的酝酿以及操作上的实践,终于在日本横滨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小说杂志《新小说》。《新小说》发刊词中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梁启超认为小说有四种力熏、浸、刺、提。“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小说哉，可畏小说哉！”^[10]

从相关讨论文章到《新民丛报》中的征文，再到《新小说》的创办，我们发现这一系列的轨迹最终完成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思想。他的小说“启民智”的思路一直贯穿在办刊始终，尤其强调小说的通俗性和普及性，要求所有来稿用俗语来写，这么做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普通大众去阅读并接受小说，并且从小说中得到思想上的开蒙。但这种小说启蒙思想在办刊宗旨感召下如何真正去践行，则要看整个撰稿群体对这种思想的理解和转化程度。

2. 小说启蒙思想的传播者——《新小说》撰稿群体

在晚清甚至民国初期，一份文学杂志固定的撰稿群往往意味着这批人拥有相同的思想主张，相近的文学理念。一些学者认为，《新小说》的创刊意味着中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拉开帷幕。因为《新小说》的发起人和稿件作者大多来自社会中间阶层，并且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一批知识精英。这批人大多数仕途不顺遂，与清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思想。

《新小说》的作者群体比较杂乱，很多来稿一直使用笔名，并且有些作者还不断地更换笔名，数据整理存一定偏差。本文主要根据付建舟《小说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整理的关于《新小说》作家状况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狄葆贤、罗普、周桂生、吴研人、雨尘子、周树人、南野浣白子、璵斋主人、无歆羨斋主，东莞方庆周、周祥俊、洪炳文、颐琐、川南波山人、啸天庐主、水月庵主^[11]等。以下根据不同类别划分的数据：

根据作者各自的政治思想倾向来分类（总人数约 60 人）：

倾向的派别	维新派	革命派	民主进步人士
人数	9	13	2
百分比	15%	22%	3%

（参考付建舟《小说革命的兴起与发展》^[11]）

从这组数据看出，《新小说》的作者队伍不仅限于维新派。当时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时，他不再局限派别，开始主动联合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精英，只要他们愿意参与这场小说救国的运动中，都进行吸纳接受。小说界革命是维新派发动，但却是由维新派，革命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如李伯元、吴研人等共同参与的一场文学革新运动。^[12]这场波及晚清各个思想领域的爱国救亡的文学革新运动，也为《新小说》的发行打通了道路。

经过戊戌变法的沉痛教训，梁启超从“维新派”的小圈子开始转向了更广大的知识阶层，以“小说启蒙”这个点打破了晚清思想派别的局限，争取到了更广泛的来稿。我们从来稿作者的出生地来看：

出生区域	岭南知识群体	江浙知识群体
人数	16	14
百分比	27%	23%

（参考付建舟《小说革命的兴起于发展》^[11]）

从以上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来稿作者主要来自岭南和江浙两大知识群体。岭南知识群体，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他们普遍接受西学和新思想比较早。放弃科举仕途之后，思想上更大胆，更具有创新精神，所以其小说的创作实验性更强。而在江浙的知识群体，他们一般接受传统的书院教育，学术功底深厚，注重理性精神。他们其中一些人已经是科举中第之人，因为官场黑暗，弃官教书，另外一些则是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属于当时知识界的精英。

笔者认为岭南知识群体代表着知识阶层的新生代，他们有活力、有魄力。而江浙的知识群体更多的代表知识阶层的前辈。他们严谨求实，国学功底深厚。来稿作者包含了老中青三代知识群体。这些作者们不仅开启了民国时期的小说繁荣，如吴研人；也开启了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文学繁荣，如周作人，陈独秀。

这两个地域的知识群体可以同时《新小说》上发表文章，可见在当时知识群体对“小说救国”思想认可度之高，参与愿望之强。这份杂志如同梁启超最初的愿景，为拯救中国创建一个共同的对话场域。

《新小说》是一个复杂思想的集合，它包括不同政见者、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以最大的包容度去吸收爱国的知识群体。它感召了全国的拥有新思想的知识精英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去启迪这个民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整个知识界的思想脉动。

3. 小说启蒙思想的实践——《新小说》内容的呈现

《新小说》杂志从创刊到停办一共 24 期，其中“小说”标志的栏目有 13 种，涉及小说类别庞杂，比如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等。^[13]梁启超在创办杂志的同时，也进行了小说创作的践行。比如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主人公黄克强是革命派，李去病是改良派，小说大量篇幅就在于两个人关于政治思想的论辩中展开。与其说这是一篇政治小说，不如说是一篇政论文。因为小说大约 2 万字，而对话论辩部分则有 1.6 万字左右。众所周知，小说的本质属性是叙事性，如果只是把小说当作政治的演说工具忽略故事和情节，那么就降低了小说的可读性。梁启超的这篇小说并未写完，但他将小说与报纸结合的理念以及小说启蒙的思想则对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小说》杂志开启了用创作小说来启蒙大众的新潮风气。一时间此类创作层出不穷，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作家有意识地以小说为武器，针砭社会时弊，大多数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为主。这样的风气下出了不少精品，像吴研人刊登在《新小说》的作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是这类小说的精品之作。尤其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引发了轰动效应。小说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视角展开，通过其社会上的游历见闻，集中揭示了晚清政治腐败、经济失序与道德沦丧，其“怪现状”实为社会常态。它在批评社会深层弊病的同时也透显了人情温暖。这部作品是观察晚清社会危机与文化转型的重要文本。又如政治小说《红祸水》，小说借法国大革命反思知识分子的角色，强调行动胜于空谈，主张以生命赴死换取自由，进而纠正维新失败的教训，提倡牺牲精神，以谭嗣同等人为榜样，号召民族为政治变革而奋斗。这篇小说突破了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主张暴力革命救中国。当然除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以外，《新小说》刊登了大量的翻译小说，这也是介绍西方思想的重要窗口。

总体来讲，《新小说》开启了以报刊连载形式出现的文学杂志时代。杂志的兴起，稿费制度的建立，小说的需求量激增，尤其是小说救国这种思想的普及深入人心，晚清知识分子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投入这场不见刀枪，只有笔杆的救亡运动中。《新小说》创刊以后，带动了近代中国的报刊界大量文学期刊问世，如《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等。现代文学批评家阿英说，他们是利用了小说的形式，从事新思想的启蒙。在那个时期描写两性私生活的小说都不被重视，出版商直接拒绝刊印。比如《绣像小说》就明确拒绝印行此类的才子佳人小说。

民间社会开启了“不见刀光剑影”的革命，清政府很快洞察这种行为的危险性。1903 年，清政府颁布禁止“煽动性”文学的告示：《新小说》以及其他杂志和小册子，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寰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14]此番告示直接表明，《新小说》以及其带来的影响直接威胁到了清政府统治的思想基础。

不过，当时兴办的小说杂志在多重因素作用下逐渐改变了“小说启蒙”的立场。首先，市场导向和读者趣味的转变，使政治启蒙内容让位于通俗消费，原先充满“载道”功能的政治、科学小说逐渐让位于市场导向的通俗文艺作品；其次，小说启蒙功能被功利化工具化，小说成为改良社会、开发民智的工具，缺乏深层思想的反思，文学价值被弱化；再者，清政府高压政策限制言论出版，有启蒙倾向的作品被禁止刊出；另外，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文学在报纸杂志的传播下走向了大众视野，其审美性成为读者的重要需求。从《新小说》到《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我们发现小说由政治功利性到文学

本身审美性的逐步转变。不但在写作内容上有所转移,写作方法上有所提高,对小说本身的审美性的追求逐步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启蒙立场不再成为杂志的主导方向。

小说启蒙的思想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中从高潮走向了低估。但小说启蒙的思想仍然是深入人心的且是知识分子的拿起笔杆战斗的重要思想支撑,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小说启蒙思想的一种延续。

《新小说》杂志不仅是一份文学杂志,它还反应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技术、教育革新等综合因素背后的独有景观,其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于“现代中国”转型的探索,也集中体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救亡”思维。不过,梁启超将小说提升到“救国”的地位,夸大了其政治功能,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小说本身的审美价值。虽然其文艺思想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其开创了文学杂志的先声,带动了后来知识群体用“杂志”的形式来作为阵地宣传新思想的风气。上文我们探索了《新小说》的创刊与发展,抓住小说启蒙这一思想去把握晚清至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从中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知识群体在救国道路上的不同尝试。钱穆先生说过,任何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都会一步步顺着时代和前人的思想,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将小说的思想启蒙这样一条线索放置在晚清社会中去考察,不仅能了解这时期文艺创作的思想也能顺着这条思路把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脉络。

参考文献:

- [1] 刘畅.《〈新小说〉杂志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2年,第1-125页.
- [2] [日]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集稿》[M],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 [3] 张怀宇.《启蒙的精神与救亡的努力——试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69-73.
- [4] 苟强诗.《小说界与现代小说概念的生成》[D].重庆:西南大学2009年,第1-72页.
- [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55~657页.
- [6]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N].《万国公报》,1895年第77册.
- [7]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7页.
- [8] 米列娜编,伍晓明译.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 [9]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N].《新民丛报》,1902年第17号.
- [10] 梁启超.精读梁启超[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 [11] 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2] 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研究导论——以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J].兰州学刊,2007,第151-153页.
- [13] 梁启超编.《新小说》(1-6卷)[M],上海:上海书店复印.1980.
- [14] 杨霞编.《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141页

(校对:宋朝红 排版:袁骁)